

10. 12

无锡历史名人传



王德昭



33

编辑说明

一、本书定名为《无锡历史名人传》。编写本书的目的，在于表彰在历史上曾有过相当贡献、在社会进步潮流中起过正面作用的人物，藉以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历史遗产，为当前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书由政协无锡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无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无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人力编写。编写工作采取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专业工作者组成编写小组，归文史会、地方志编委会和文管会共同领导。

三、本书所收录的历史人物，上起古代，下至当代，凡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全国性影响或在无锡历史上有重大影响者，不论其官阶、品级、地位、职称，皆在收录之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所收录的人物，其生平行事一般皆可盖棺论定者。

四、本书所收录的历史人物，以出生于无锡市（县）境内或一生主要活动在无锡者为限。

五、本书对传主一生的重大活动，要求作系统叙述。在时间上要求落实到日子，遇有实际困难者可稍放宽，但也要求落实到月份、季度。在空间上要求落实至乡或相当于乡一级的地方行政组织。个别不得已者可放宽，但要求落实至县级。

六、本书对传主活动所在之机关、学校、企业的名称，

开始时均应用全称，嗣后行文可用简称，但须以约定俗成为限，切忌杜撰缩略名词。

七、本书纪年，民国前用朝代和年号，夹注公元纪年。民国后以公元纪年。公元纪年与朝代年号之对照，一律以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所附年表为标准。

八、本书对传主之名、号、别号一律要求考证确实。对传主著述之书名（包括别名）也要求叙述清楚。如遇该著述收入某一丛书之内，对该丛书之编辑及出版者亦应作简要介绍。如原书已散佚，仅存书名，亦应在行文内说明。

九、本书一律采用记叙文。要求通过事事实现对传主的评价，切勿脱离事实作空洞的评论。事实的取舍，叙述力求符合人物的历史本来面目。

十、本书对传主，要求把他的家庭情况、主要社会关系、经历和言行、生平活动如实反映，但与年谱有区别。重要的可以写得详细一些，反之可以简略一些。

十一、本书一律采用白话文，文字力求简练、生动、流畅。资料来源须在文后注明，尽量避免引文。引文要详注出处。每篇以3000字为准，最多不得超过5000字。

十二、本书篇幅暂不规定，视资料来源多寡，暂以10万字左右为一册，由内部出版、发行。如数量、质量达到预定要求，再商洽有关出版社公开出版。

十三、本书所收稿件的最后审定权归文史会、地方志编委会和文管会。

认识家乡 认识祖国

——代发刊辞

(一)

《无锡历史名人传》第一辑，今天和读者见面了。我们怀着不安的心情，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我们这个编写班子，虽然有老、中、青三方面的专业人才，其中也不乏在历史科学研究中有成就的学者，但作为一个群体来说却还是年轻的，对这一项工作还缺乏成熟的经验。《无锡历史名人传》的编写，是经1987年无锡市人文景观研讨会倡议，由我们三个单位承担的。关于本书编写的宗旨，我们已经在《编辑说明》中说明了。现在我就说明中涉及的几个问题略作申述。

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由众多的地方的历史所组成。这些地方的历史又总是处于国家历史的总体运动之中。一个国家历史发展的规律，是由无数地方历史发展规律概括中得出来的，而这个由概括而得的一般发展规律又制约着地方历史的发展。由于各个地方都有其特殊的自然和历史条件，这个一般发展规律在个别地方都有它的特殊的表现形式。因此，一切有成就的历史研究，都是微观和宏观研究的有机结合。从事微观研究，又从宏观上总揽全局。亦即是说，在落实微观研究的同时，又把研究放置于宏观的总体运动之上。正是这两者的统一，促使历史科学的研究既能避免一般化的毛病，

又能脱出时空的局限性。我国古代史学名著《史记》一书，在作者司马迁精心设计的记传体中，通过本纪、世家、传、书、纪、表等等格式，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运动熔铸于一炉，正是体现了这样的统一，虽然他并不是完全自觉地这样做的。

近几十年来，地方史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上一股重要的学术潮流。我国史学界也有不少学者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这一方面来，并已作出了相当的成绩。用马克思的革命哲学考察历史，改造历史科学，其中包括地方史，固然还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情，地方史尤为年轻。但在我国，地方史却源远流长。在先秦时被视为国别史，但后来却公认是地方史的《春秋》、《梼杌》等等且不说，后来的《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等都是有定评的地方史著作。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展到自宋以来绵延将近一千年的方志传统，则我国地方史的悠久传统是任谁也不能怀疑的。因此，今天摆在我们地方史工作者面前的任务是：如何批判继承这一笔历史遗产，并以此作为我们在地方史这一事业中继续开拓的起点。

可是当前地方史的研究和编写面临的问题不少，诸如国家的历史和地方史研究的对象范围考察思考上的以及历史科学在发挥其社会功能中两者的分工合作问题；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以重大事件为标志的历史阶段性在两者中间的统一和差别问题；在方法论上如何吸收宏观研究的成果，又如何

在微观方面掌握相应的思维方式，从而摸索出一套属于地方史研究的方法体系问题；有关地方史编写的体例问题，包括断限、标目、编次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等等，都有待于解决。因此有关地方史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就和地方史编写的兴起同时提上议事日程。我们既不能照搬一般历史著作，但也不能全然处之不顾，自搞一套。这里应该是既有所承袭，更有所创新。地方史作为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是古老的，又是后起的，在这块园地里，一个稍具识、才、德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大有发挥其智慧和能力的余地。我们这个年轻的群体，便是本着这样一种愿望，参与这个行列的。学养有限，只能做出一分成绩便算一分成绩。

二

《无锡历史名人传》顾名思义，是为无锡地方历史上知名度比较高的人物编写的传记。这是我们对无锡地方史研究的一个方面，且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之所以在对无锡地方史进行综合研究的同时，又开辟研究历史人物这个领域，道理极为简单，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人是历史的主体，离开了人这一主体就没有历史。因此，研究历史，不能离开对人的研究。两千多年以来无锡的历史，是活动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在不同时间内创造性活动的累积。由于一个人在知识、才能性格、气质、哲学观点、社会立场的不同，他们对历史的贡献也有所不同。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推动地方进步中都起

了作用。对这些人物进行研究，弄清楚他们一生的情况，判断他们的是非功过，可以加深我们对无锡地方历史发展的认识和理解。历史人物研究在历史科学领域中，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之所以成为热点，应是可以理解的。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空前未有的改革。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方面的改革也在逐步深化。在哲学方面为了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重视哲学主体性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今一股热潮。历史科学中关于历史的主体以及主体意识的讨论，已普遍得到重视。大家认为只有在这方面讨论得深透，才能使历史科学摆脱过去机械论和教条主义的禁锢，走上发展的康庄大道。在过去我们的历史著作中几乎是看不到主体的人的积极作为，他们成了阶级的符号。他们的性格、气质、情感对历史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只是执行某种社会力量意志的工具。

因此，任何一起历史事件，仿佛都只是某一套现成公式的图解，没有任何个性色彩。“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在机械论者看来，历史运动似乎是宿命地按照所谓客观规律在朝着既定的目标迈步，它的走向和势头似乎也是预定了的。由此可见，我们真正要按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历史，就不能撇开对人的研究。“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出发点。要重视历史主体的研究，历史本身可以提出无数事实的证明。由于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曾经给予历史以不同的面貌，涂上不同的色采，造成一代风气，并给

后代以深远影响。就地方史范围来说，也可以见到类似的情况。这几年来，我们在无锡地区进行过社会调查，发现在这4650平方公里以内，各地有不同的“乡风”，追问这些不同的“乡风”的来源，发现它们往往和当地所出人才有关，是由这些人的事业成就、人格精神力量所带动的。限于篇幅，恕不一一举例。要是我们忽略这一点，单纯从社会经济基础方面去找原因，那对于这类有其特殊性的“乡风”的形成，是很难说得清楚的，也很难说得圆满的。

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难点”。对历史人物进行研究，说到底，无非是对他们（她）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作出符合实际的估价。历史研究作为认识的全过程，历史人物是认识的客体，对于这个认识的客体，我们需要全面掌握有关的资料，社会的和个人的，需要对这些资料作出价值的判断。和它相对的是研究者都具有主体意识，在主客体相互交接的过程中，主体意识必然要渗透到认识的客体中去。因此认识主体的知识修养和立场的不同，往往会影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所得结论可能会不相类同，甚或相反。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我们的理解，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表现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认识主体意识的渗透，便是当代的影响。因为其中研究对象的选择，对象价值的判断，以及作出这种价值判断的尺度，都有当代的影响。

我们在这本书里，从无锡地方历史上众多的人物中选择了近百个人物，就我们所能搜集到的资料分别为他们编写传记。在这近百个人物中间，有生活在遥远的古代，虽无文献足征，但两千多年来在人民心目中一直是看作文明的象征。有生于鼎盛的封建时代，作为一门艺术的创始人；有生在“天崩地解”的中世纪末叶，以胜国遗民的孤愤，兀兀经年记录一代史实的人。更多的是近现代人物，他们或则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作出了贡献，或则生前并不为人所知，但却在学术上有相当造诣；也有革命年代的风云人物，但因晚节不终而为人民所遗忘的人；有潦倒终生，沉落在社会底层，但遗留下了震动国际乐坛的作品，永远给人以美的享受。所有这些人物，虽然各有各的生活道路，但都在历史的进步运动中起了推动作用。他们的成就，有无锡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透过他们的活动，我们可以认识不同时代的无锡。

附带要说明一点，历史上的反面人物，我们没有为他们留有篇幅。原因是“名人”一词在习惯上是个正面字眼，有“褒”而无“贬”义，这样做是名副其实的。另外一个原因，我们编写本书是抱有明显的目的性的，我们要以这些人物的一生事迹教育后一代，作为鼓舞后一代上进的精神力量。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法古今完人”，收进名人传中的人物虽不能说是完人，但都有一个方面足资为后一代效法的。

三

本书为之立传的近百位传主，都是已经作古了的历史人物，现在还健在的，即使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我们都不准备为他们立传。我们恪遵中国史学的一个好传统：“生人不立传。”我们认为古人之所以定出这样一条戒律，是总结了编史修志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理由是相当充分的。任何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经历，他们在特定的时空环境里活动，其客观效果往往不是个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主观上的修养也各不相同，对自己行为的道德责任，有自觉的，也有不自觉的。加上善和恶的标准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因此，对一个人的全面评价，常常是要到盖棺才能论定。当他继续活动的时候，有很多还是属于未知的项目，那就很难给予评论。更为麻烦的是，一个人行为的客观效果，并不是与行为同步的，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为人所觉察，为人所理解。对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尤其是如此。这也就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难处。因此盖棺论定也只是相对的。盖棺而不能论定的人物也是有的。有鉴于此，坚持这条原则，相信对于我们的工作，只会有好处，不会有坏处。在进行历史名人传记编写的时候，我们是时刻以对社会、对历史负责的要求鞭策自己的。我们的工作虽然局于一隅，影响所及也不能和史学名家的著作相比拟，但不管怎样，责任感是最基本的要求。

不错，当前传记、词书一类书籍已出版的不少，其中有很多

多是打破了这一传统的。和他们相比，我们“生人不立传”的规定，似乎显得非常保守，缺乏革新精神。关于这一点，我们愿意向读者说清楚，我们这本书，是一本正式的人物传记，是地方史研究中的初步成果。目的是为了探索无锡地方的历史发展轨迹。上面所提到那一类书籍，属于工具书性质的较多，尽管也用传记或评传一类名称，它们的目的重在介绍，便利读者了解和熟悉有关的人物，两者性质不同，编写目的也异趣，所以是不能类比的。

《无锡历史名人传》是一本普及性的历史读物，它要求深入浅出，有清新活泼的文风，具有较高的可读性。但作为历史研究的成品来说，它要求具有“史法”，应该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鉴别和运用上有严格的要求。古人治史“无征不信”的态度，应该成为我们的准则。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是把史料融会贯通以后自然而然地得出来的，主观臆测，强史料以就己的作法，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因此，评价既公正且客观，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检验。至于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表达和叙述方式，我们是“以史带论”，亦即一般所说的把论断寄寓于叙事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陆续编辑出版的《中华民国人物传》为我们提供学习的模式，是我们取法的榜样。当然，由于我们学力远远不能和专家们相比，在这里能够学到几分，那是很难说的，有待于读者的鉴别。

关于本书的编排，我们采用分册编辑出版的办法，每辑

发表的是在我们看来都较为成熟的作品。我们从实际出发，成熟一批，发表一批，因此，每辑所列人物，是古今皆有，并不按照年代来划分和编排的。这个工作，要等到整个工作告一段落，同时获得社会的承认以后才有可能，这只有俟诸他日了。我们的工作，还是探索性质的，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关于面临的困难，我们只有一条路好走，那就是用锲而不舍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亲爱的读者，让我们携起手来，为认识家乡，认识祖国，建设家乡，建设祖国共同努力吧！

(王质唐)



目 录

- 太 伯 冯普仁 (1)
李 绅 张 震 (4)
李 纲 顾一群 (11)
倪 璞 陈瑞农 (18)
邵 宝 叶 勤 (23)
华 察 尤 伟 (30)
计六奇 章振华 (36)
杨潮观 赵承中 (39)
孙 淑 赵承中 (45)
徐 寿 顾一群 (49)
薛福成 夏刚革 (55)
华蘅芳 史新耕 (61)
许 珙 方 耘 (68)
周廷弼 冯 炬、刘曼殊 (75)
吴芝瑛 秦寿容 (81)

蔡城三	李志霖	(87)
高 阳	朱若溪	(92)
刘群先	朱显鸣	(97)
阿 炳	倪 波、沈道初、沈祖方	(103)
俞庆棠	浦耀煌	(107)
丁福保	陆柏年	(114)
唐文治	陈其昌	(119)
辛一心	姚方勉	(126)
侯鸿鉴	方玉书	(132)
许莼舫	许玉声、许树声	(138)
钱海岳	斐 麟	(141)
华 山	王赓唐	(147)
蒋锡昌	王赓唐	(153)
薛明剑	顾一群	(157)
杨荫浏	许忆和	(165)
王昆仑	夏刚草	(170)

太 伯

太伯，一作泰伯，姬姓。商代晚期岐山周原（今陕西岐山县）人，后南奔荆蛮，定居梅里（今无锡县梅村镇）。人们历来把他看作是江南地区文明开始的象征。

太伯的父亲古公亶父，一作古公亶甫，省称古公，亦称亶父，即周太王。周部族自始祖后稷起，传至三世孙公刘时，定居于豳（今陕西邠县），开垦耕地，从事农牧。又传九世至古公亶父，为避戎狄侵略，率领族人沿渭水而下，迁居岐山下的周原，开始设置官吏，规划土田，营建城郭居邑，奠定了东进灭商的基础。

古公亶父想翦灭商王朝，夺取天下的王权。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一名吴仲或虞仲），幼子季历。季历生子昌（即周文王）。古公亶父晚年，认为昌有兴王业的才能，想传位给季历，再由季历传给昌。太伯、仲雍兄弟二人知道父亲的意图，便遵循父志，决定让季历继承周国的君位。

约当公元前12世纪之际，古公亶父患病，太伯、仲雍假借到衡山（今浙江吴兴县境或江苏江宁县境）采药的名义，率领部分周人横跨陕西中、东部，穿越河南、安徽，千里迢

迢南奔到今苏南一带的荆蛮之地，并随乡入俗，接受荆蛮土著居民“断发文身”的习俗，剪短头发，在身上刺染纹饰，穿戴土著服饰，表示不再回去。古公亶父病卒时，季历曾到吴地带太伯、仲雍二人奔丧，太伯、仲雍让季历主持丧事和祭祀祖先，继承父位。兄弟二人再三礼让，最后还是由季历继承古公亶父的君位，做了周国的君主，称为公季。

太伯奔丧事毕，还归荆蛮，定居梅里。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拥护，荆蛮人民从而归附者千余家，被奉立为当地的君主，称吴太伯。建立了居住东南的荆蛮小国，自号“勾吴”。周灭商后，追封其三世孙周章为“吴伯”，改称吴，列为诸侯。

当时正是商代末年，商王朝衰落，社会矛盾激化，中原地区的侯王屡次相互用兵。太伯深恐兵祸波及荆蛮，便效法其父古公亶父所筑岐周故城的制度，在梅里平墟修筑城郭。梅里地势平坦高亢，北面丘陵起伏绵延，东面湖泊密布，南濒太湖，是较为理想的建都之地。这座土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名曰“故吴”。城内建造官室住宅，居民在城郭中耕地务农。城郭的建立，是勾吴国建立的标志。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都以梅里为都城，后迁吴（今苏州）。直到吴国灭亡后，太伯城才逐渐废弃，被称为“故吴墟”。至唐代还保存城内的宅、井等遗迹，以后历遭水火破坏，故城遗址才荡然无存。

太伯定都梅里后，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曾“穿浍渎以备旱涝”。相传太伯率领当地人民开凿太伯渎，俗称伯渎港，长78公里，宽12丈，这条人工运河的开凿，有利于农田灌溉和交通运输，人民世受其利。太伯还提倡饲养家禽、家畜，在梅里有鸭城，相传为太伯牧养凫鸭之地，去鸭城不远又有麋城，是当年太伯豢养麋鹿之所。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制陶业也很发达，并能冶铸小件铜器。由于太伯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以致太伯立国以后，“数年之间，民殷殷富”，促使江南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

太伯无子，死后由其弟仲雍继位。太伯死后，葬于梅里东之皇山（后改称鸿山）西南麓。东汉桓帝永兴二年（154）四月，命吴郡太守麋豹监修太伯墓，并在太伯故城中“即宅为祠”，建造太伯庙，供人们祭祀瞻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多次整修太伯墓、庙，遣官致祭，赐田封爵，列为褒典。文人雅士纷纷前来瞻仰太伯墓、庙，寻访太伯故城遗迹，留下了不少诗文，反映了千余年来江南人民对吴国开创者太伯深厚的景仰之情。

（冯善仁）

参考资料：

1. 《左传》。
2. 《韩诗外传》。
3. 《史记·周本纪》。
4. 《史记·吴太伯世家》。
5. 《吴越春秋·吴太伯传》。
6. 《梅里志》。